

# 新马印华人

族群关系与国家建构

李元瑾主编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新加坡  
亚洲研究学会

# 新马印华人

族群关系与国家建构

李元瑾主编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新加坡  
亚洲研究学会

# 新马印华人

---

## 族群关系与国家建构

- 主编 李元瑾
- 出版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Kent Ridge P.O. Box 1076  
Singapore 911103
- Konrad-Adenauer-Stiftung  
34/36 Bukit Pasoh Road  
Singapore 089848
- 排版 TimeEdge Publishing Pte Ltd
- 初版 2006年11月
- 国际书号 ISBN-13: 978-981-05-6818-4  
ISBN-10: 981-05-6818-5
- 版权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Konrad-Adenauer-Stiftung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谢启

作为主编，我要感谢作者们贡献佳作，丰富本书内容。我也要感谢 Konrad-Adenauer-Stiftung (KAS) 的资助与合作，使本书得以出版中英两种版本。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理事们的关心、副会长何启良博士的从中协助，我也在此表达谢意。游俊豪博士，他是学会的会员，也是我南大同事，从本书的编辑到出版，都积极参与，这简短的谢启不能少了。最后，让我借此机会，向四年来我担任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长期间，那些赞助、参与和支持我会各种活动和出版的团体和个人，致以至诚的敬意与谢意。路，还很长，学会需要大家继续关心和支持。

李元瑾

2006年9月

# 作者简介

- 何国忠**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
- 柯思仁**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 李元瑾**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中文系主任。
- 廖建裕** 新加坡华裔馆馆长、南洋理工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所客座教授。
- 王庚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 文平强**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主任。
- 杨聪荣** 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社会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 游俊豪**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员，并在该大学中文系里教课。
- 曾 玲**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 周南京**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
- 周兆呈** 新加坡《联合早报》助理编辑主任，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博士。

# 目录

导 论	族群关系与国家建构 新、马、印华人三种模式 李元瑾	1
第一章	东南亚新兴国家中的华人族群性 王赓武	13
	新加坡	
第二章	族群分化与建国目标分歧 南洋大学创办前后的角力 李元瑾、周兆呈	33
第三章	新加坡多元文化剧场中的意识形态 柯思仁	63
第四章	社会变迁与当代新加坡华人 宗乡社团的转型与发展 曾玲	83

## 马来西亚

---

- 第五章 空间隔离与族群排斥  
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  
文平强 123
- 第六章 马来西亚华巫领袖与华人文化  
何国忠 149
- 第七章 族群与国家  
20世纪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  
游俊豪 175

## 印度尼西亚

---

- 第八章 族群关系与国家建构  
印尼华人个案研究  
周南京 195
- 第九章 族群关系与国家政策  
现阶段的印尼华人  
廖建裕 213
- 第十章 从暴动看印尼的华人与族群问题  
以新秩序晚期的社会暴动(1994-1997)为例  
杨聪荣 229

## 导论

# 族群关系与国家建构 新、马、印华人三种模式

李元瑾

族群的相处与国家的建构，两者关系非常紧密。族群是否和睦共处，影响国家的建设与团结；而国家实施的族群政策，则影响社会的分裂与整合。这种互为因果的现象，在新兴的、多元族群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显著。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华人的处境与发展，必然留意他们如何参与新国家的建立、如何与土著及其他族群相处。而华人数目占总人口比例差距悬殊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正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也为我们展示了三种不同模式。

二战后，东南亚人民致力于摆脱殖民地统治，并开始想象和模仿西方，建构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他们除了反殖民的愿望和经验之外，并没有具备西方组织民族国家时所拥有的共同语言、宗教和历史记忆等有利条件。更何况，殖民地时代还遗留下族群之间的种种分歧与矛盾。以新、马、印三地来说，他们还有两个共同点，即多元种族的社会特质和历史悠久的不同文化根源。这两个特点，可以是新兴国家的丰富资源，也可以是建构国家的巨大障碍。关键在于掌权者是否高瞻远瞩，主流群体是否宽厚大度。对于新、马、印三地华人来说，他们在学习如何参与建设新国家的



过程中，还必须面对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的严酷挑战。

国家建构过程中，东南亚华人的族群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课题。踏入21世纪，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即以“新马印华人：族群关系与国家建构”为主题，举行一次中、英双语的国际学术会议，邀请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台湾和中国等地的专家学者，从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不同层面进行探究和切磋。会议之后，英文组的论文经过修订，已结集出版。<sup>1</sup> 本书的第一篇在会议上以英文宣读，另有六篇曾经在会议中文组宣读，过后由作者修订。其他三篇相关研究则另外寄自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学者。王赓武教授在会议上的主题演讲，翻译成中文后列为本书之首章。其他9篇按照主题三国排列的秩序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呈现，各有3篇，且依探讨内容的时序或逻辑分先后。另外，本书的英文版也同时面世，都由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和 Konrad-Adenauer-Stiftung (KAS) 联合出版。

在本书里，“族群”一词，是指向操不同方言/语言的“语群”或不同肤色的“种族”。至于“族群关系”，则包括华族内部不同方言群体之间/不同教育背景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华族与其他种族之间的关系。从华族角度研究族群问题，有些地方重视汉族/华族内部的纠葛，例如台湾的族群问题，被关注台湾的学者视为“不过是汉族自己人的龃龉”；<sup>2</sup> 有些地方则强调华族与其他种族的矛盾，例如马来西亚的族群问题，论者经常从种族的角度出发。这是各地历史与现实情况不同使然。如果在东南亚“国家建构”的框架下考察“族群关系”，那么情况更为复杂，因为这又牵涉到华族与殖民地政府之间、华族与华族主导的政权之间、华族与土著政权之间的种种问题。

王赓武的〈东南亚新兴国家中的华人类群性〉是一篇富有引导性和启发性的精彩论文。他为主题的关键词作了诠释，指出族群的划分通常是以

文化为中心，族群的自我意识即体现在文化根源意识。他认为族群有其历史和进化的过程，每个族群有自身文化认同意识，而国家建构则是现代现象，人为痕迹极其明显。因此，以深厚文化自豪的华族，参与新、马、印新兴国家的建立，同时又得面对文化源远流长的其他族群，这是个巨大的挑战。华族要从一个以文化为基础的社群转向以国家为基础的社群，即由文化认同转向国家认同，已经是一种很不容易的调适过程，何况三地自身的国家概念还是处在薄弱的阶段。而正当学习接受国家新概念时，全球化的冲击，又迫使华族将视野越过国家疆界，甚至转回到文化认同。全球化可能对国家建构产生反作用，但也可能为华族提供一个窗口，借以处理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 新加坡模式

在本书“族群与国家”的框架下，以华族人数占绝大多数（超过全人口的四分之三）的新加坡，形成它特有的模式。学者们探讨新加坡的族群关系时，不免触及华族内部不同方言/教育背景所组成的群体之间、华族与异族之间、华族与异族政权之间、华族与华族主导政权之间的种种关系。本书以新加坡为研究对象的三篇论文，即围绕这几方面进行讨论。三文各自以华文大学、华族剧场和宗乡社团作为讨论的课题，研究时段分别是1950年代、1960至1990年代、1980年代至今。

李元瑾与周兆呈的〈族群分化与建国目标分歧：南洋大学创办前后的角力〉论述1950年代新加坡自主独立前夕，华族与马来族之间、华族内部华语群与英语群之间、华语群与殖民地政府之间，因为支持与反对南大创办而显现的分歧与矛盾。当时，各个族群对于国家建构有不同的想象和论

释，南大的创办，为各个族群表述国家建构目标提供了一次交锋的舞台。在各族群较劲的过程中，英国殖民者利用其他族群的反对声音来对抗华族群的力量，后来为了抵御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展，听取美国意见改变对南大政策，由“默反”转为“默认”。意识形态的介入，使族群矛盾更加深化。南大就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中诞生，注定往后必须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在建构国家的过程中，新加坡官方与民间剧场对于创造种族和谐共处与多元文化认同有着共同的想象，却也有各自的诠释和表述方式。柯思仁的〈新加坡多元文化剧场中的意识形态〉，在探讨剧场中的多元文化表征时，形容1960至1970年代是集体想象与共同信仰的年代，1980至1990年代则是各自表述与神话结构的年代。他认为在第一个时期，民间剧团所展示的行动与官方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出现许多互相契合的情况，唯其实践方式更具热情和创造力。来到第二个时期，官方话语标榜务实主义，声称不谈意识形态，甚至压制剧场中他们认为具有危险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民间剧场虽然避讳直陈意识形态，但通过不断创新形式如多元语言形式，对多元文化现实，进行更深刻的表述、反思与批判。

曾玲的〈社会变迁与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转型与发展〉，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置于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大背景之下，从认同形态、组织结构、运作内容和未来趋势，探讨宗乡社团的转型与调整。从族群关系与国家建构的角度考察，政府在建国初期，为避开马来世界的猜疑，将种族及其文化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下，导致宗乡社团被边缘化。直到1980年代，国际与区域的形势转变，政府调整其文化政策，宗乡社团才获得发展的契机。宗乡社团已培养对新加坡社会与国家的认同，从此更坚持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多元文化认同。而随着中国和平崛起和世界全球化趋势，宗乡社团以宗乡文化为纽带，与中国和世界华人建立跨境网络。新加

坡宗乡社团经历了王赓武教授文章中提到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转换，以及从全球化冲击中找到了拓展空间的窗口。

## 马来西亚模式

马来西亚的华人人数，占全国人口近四分之一，其比例远不及新加坡，却又比印尼强得多，形成另一种模式。就因为人口比率不是太小，华族在文化上拒绝被土著同化，成为经济因素之外种族矛盾的症结。而长期以来，官方的族群政策，则是种族疏离与冲突的根源。除了种族摩擦，马来西亚也存在华族内部不同教育背景族群之间的分裂。本书讨论马来西亚的三篇论文，分别从空间隔离与族群排斥、华巫领袖与华族文化，以及华文作家的国家与族群意识，探讨国家建构与族群关系；追溯种族隔阂的重要背景、展现族群之间的重要矛盾、提供华族在认同上挣扎的具体个案，彼此正可以互相参照。

文平强的〈空间隔离与族群排斥：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主要从历史的观点来测试产生自发展政策的族群关系中的空间隔离与族群的排斥性，并检视中央权力机构所启动的社会操控和空间区隔机制如何通过‘族群的方式’来处理族群关系。”（论文“引言”）殖民政府推动发展政策时，利用不同种族的经济潜力，为他们进行经济角色的分配和空间上的圈地设限。马来西亚建国前后，政府的几项发展政策新村、土地计划和新经济政策，进一步巩固族群的空间隔离状态。当地各种族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经济角色、社会区隔和政治目标，族群关系从隔阂走向排斥。殖民政府采用空间隔离政策处理族群关系，独立后国家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则在空间隔离之外增添一道族群围墙，族群关系始终无法获得妥善的处理。

发展华人文化是否妨碍国家建构一直是马来西亚族群之间争论不断的课题。在〈马来西亚华巫领袖与华人文化〉一文中，何国忠形容华人文化为华巫两大族群领袖心中的垒块：华族领袖认为中华文化是族群身份的重要特征，华文教育必须得到发展；而马来族则视马来文化为国家主体文化，其他族群文化得为国家的建构让步。即便是华族内部受中、英文不同教育的华人领袖，对华人文化的诉求也有分歧：董教总领袖坚持文化传承是不能删删减减的，而马华公会领袖则认为任何要求都应以国家的稳定为前提。文化分歧加深了族群裂痕，被视为1960年代末五一三暴动的一个原因。华人文化的发展一波三折：1970/80年代，在二元对立的差异中挣扎；1990年代，情况有所改善；但世纪之交，路上还是多风多雨。

在建国路上，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经历了国家认同的转移，却也陷入维护族群文化的困境。游俊豪的〈族群与国家：20世纪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讨论20世纪马华作家所展现的几种有关国家与族群的思想意识及其变迁。他指出，除了文学想望，马华作家内心存在着族群想望和国家想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想望占据了他们的注意力。1949至1969年，他们的本位意识从中国转移到马来西亚，但热情随着1969年种族暴乱而淡化。1970年代之后，如何在种族政治情境中维护华人的族群特性，时时困扰着他们。于是，一些作家选择台湾或向往中国，投入中华文化的怀抱；另一些则继续为马来西亚想望与族群想望寻求平衡点。只有改变现状，才能解除他们对马来西亚想望的疑惑；至于族群想望，一些变化已然发生，该群体的跨国性正逐渐扩大，并陆续影响马华文坛，而马华作家的身份认同也将趋于多元化。

## 印度尼西亚模式

华人在印尼的少数族群，约占全人口的1.5%到2%之间，为本书提供第三种模式。人口比例偏低，使这个拥有悠久文化的族群，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委曲求全，接受新兴国家苛刻的同化政策。不但如此，当种族问题被政治化时，他们的生命财产还受到威胁。本书另外三篇论文，即以印尼华人的处境为研究对象。前面两篇从宏观角度探讨主题，重点在当地政府的华人政策；第三篇则作微观研究，集中讨论新秩序晚期的社会暴动。在建国道路上，我们看到印尼华人步履蹒跚。

印尼华人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印尼的种族分离运动，是全世界种族问题的组成部分。周南京的〈种族关系与国家建构：印尼华人个案研究〉从古至今，展示古代印尼华人与土著向来的和睦关系；再追溯荷兰“分而治之”的政策及其遗害、八月革命的种族冲突与影响、苏卡诺(Sukarno)政府和苏哈多(Suharto)政府系列排华政策造成的种族矛盾关系，论述印尼华人问题的形成与演变。如何解决华人问题，论文也讨论了各派势力和人士在实践中或在理论上提出的几种方案，包括全面同化、大批回返中国、再移民、民族融合等；最后指出要解决华人问题，首先必须摆正印尼国家建构中的各种关系，认清阶级关系才是症结所在，而印尼社会改革和民主化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国家贫富不均和人民缺乏民主权利的问题。

廖建裕的〈族群关系与国家政策：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比较集中讨论苏哈多时代的华人政策，特别围绕在华人的宗教课题上。苏哈多时代，政府为了打造以土著为基础的“印尼民族”，推行全盘同化的政策，消除了华校、华人社团和华文媒体，甚至不再承认孔教为印尼宗教。其结果是，华人孔教徒人数迅速下降，佛教徒增加缓慢，基督教徒反而激增；而另一些华人，由于某种原因，也皈依回教。然而，华人的“印尼化”并没

有促进华人与印尼土著族群的团结，族群冲突依然不断。1998年5月，苏哈多在民主改革的呼声中下台，新政府推行比较民主的政策，准许教授华文，恢复华社与华文媒体；还改变印尼民族的定义，视华人为印尼民族的组成部份，可是许多印尼土著人士对此仍未有共识。看来，印尼民族打造的历程还很漫长。

杨聪荣的〈从暴动看印尼的华人与族群问题：以新秩序晚期的社会暴动（1994-1997）为例〉，集中讨论新秩序晚期1994至1997年之间印尼的暴动事件，从而考察印尼当时的社会矛盾，并侧重华人问题与族群问题。论文将这时期的暴动归纳为“反公权力暴动”和“部族暴动”，从地域性、行为模式、社会关系、行动意涵探讨暴动的特质；从发生原因和过程中华人的牵涉程度将暴动分成四类，检验暴动中所涉及的族群关系和反华行动。作者指出，这时期的暴动不能单从排华的角度来理解：暴动的发生有地域性因素，对于华裔的扰骚也多属临时起意，暴动本身比较接近对公权力的挑战，而以华裔为代罪羔羊，即使是华人直接涉入的，也不过是特定时空的局部事件。在新秩序时代晚期，民间普遍不能信任公权力，经常选择以暴动的方式自救，华裔则受到池鱼之灾，这是暴动出现反华现象的主要原因。

### 三种模式的纵横变化：互动与隔阂

从殖民地时代到独立建国时代，上述三种模式经历了纵向与横向的转变。

从纵向的变化来看。在殖民地时代，东南亚华人身份是华侨，与中国保持乡土、经济、政治、教育等密切关系，并经常回应中国内部的政治事

件和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华人于所在地组织华人社团、发展华文教育、兴办华文报章，以维护华人身份和传承中华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中国诞生，东南亚国家独立，彼此关系疏远了，本地区华人身份从华侨转为华人。他们很快就发现，仅仅表示对当地国家效忠不够，还必须淡化族群色彩，并在文化上退让。于是，新、马、印三地华人陷入一种吊诡的情境：华人努力参与建构属于自己的国家时，不能像殖民地时代那样，自由地发展族群的社会、教育和文化。

三地政府的建国政策，都要求华人的族群意识和文化身份向国家认同让步。这影响了当地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华人自身不同语群之间的关系。在新加坡，华人口虽然占全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建国初期掌权者的种种顾虑，使华人的族群身份、中文教育和多元文化发展，受到很大的约束，造成各种族和各语群之间的龃龉。在马来西亚，华人不是弱势少数的事实，总让主流族群不安心，华人对文化的执著经常被视为违反建国原则和目标，成为经济因素以外的另一族群矛盾症结。至于印尼，因为华人人数的比例少得可怜，族群生存似乎比文化坚持更为重要，华族宗教、教育和文化等的发展，只能仰赖政府的施舍了。综观三地，从坚持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人口比例居中的马来西亚模式，显得比较坚强，也更有表现。

从横向的转变来看。在殖民地时代，东南亚华人彼此间的关系相当密切，而中国因素是重要的维系力量。中国在东南亚的布置和经营，唤醒本地区华人的故国情怀，后来中国内部的许多政治事件和文化活动，都激起三地华人的热烈回响。而这种回应情绪和行动是区域性的，是互相影响的。1899年10月，听闻光绪皇帝久病未愈慈禧太后有意废黜，新加坡、吉隆坡、檳城、望加锡、廖内和仰光等地五百名华商联名电请圣安，便是一例。<sup>3</sup> 同年，受到中国康有为尊孔的启发，除新加坡外，马来亚的巴罗、



吉隆坡、马六甲，印尼的望加锡、巴特维亚、泗水，以及缅甸的仰光等地，华人纷纷倡建孔庙与学堂，又一例。<sup>4</sup> 另外，东南亚华人无论是响应康有为的维新、孙中山的革命或中国的抗日，彼此之间的互动都是相当频繁的。

新、马、印建国后，三地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曾经维系他们的中国元素已淡出，而新国家对他们有新要求，是各奔前程的时候了。三地建国初期，正遇国际的冷战局势，还有本地区的共产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华人的处境既尴尬又艰难。以华人占绝对大多数的新加坡，在处理华人族群和文化课题时，需要照顾国内和本地区的族群关系；而马来西亚和印尼华人，则必须避开任何可能影响国内族群关系的言行。于是，过去那种三地共同推动中华语言、文化、教育的热闹场景已消失。明显的例子如：19世纪末，新加坡民间发起的华语运动和儒学运动，曾获得马来亚华人和印尼华人的积极响应，呈现一片东南亚的文化互动的景观；20世纪末叶，新加坡政府领导的华语运动和儒学运动，并没有在马来西亚华社造成冲击，印尼方面更不用说了。在国家文化政策的压力下，马印两地的华人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对新加坡华人的文化事业亦步亦趋。于是，百年前东南亚那种互相呼应，甚至连成一气的文化景观，已走入历史。<sup>5</sup>

然而，历史的巨轮在迅速的运转。回顾王赓武教授所言：当人们正在学习接受新国家概念时，全球化的冲击（加上中国因素再度介入），又迫使华族将视野越过国家疆界，甚至转回到文化认同。从文化角度来看，新、马、印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三地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今后是否有所改变，值得我们仔细观察和进一步探讨。